

田雪原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IAN XUEYUA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田雪原

文集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	---

绪论、总论、前言、序

《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研究》绪论	7
《中国沿海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总论	19
《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绪论	55
《人口革命论》序	76
《中国民族人口》绪论	79
《中国人口管理现代化研究》绪论	98
《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绪论	104
《全国生育文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序	140
《国土资源、环境、生态与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序	142
《军事人口学概论》序	144
《中国京族、毛南族人口研究》序	146
《流动性发展》序	149
《人力资本开发研究》序	153
《嵊州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报告》绪论	156
《老龄化：从“人口盈利”到“人口亏损”》绪论	166
《社会转型期老龄问题研究》序	176
《21 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总论	178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老年人口问题研究》序	201
《中国人口政策 60 年》前言	203

英文论文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i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211
Costs of Children-Benefit Theory and Population Control	227
Reform and More Flexible Policies Promote Urbanization	240
A Macro-View of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250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o Promote Population Science	269
The Third Population Boom and Corresponding Macro-Policies	276
The Virtuous Cycle of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90
Develop the Economy, Initiate Changes and Promote the Benign Cycle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303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st of Children	320
Report on the Sample Survey on Household Economy and Fertility in the Ten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336
“Intermediary” Population Control and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359
Preface: Ma Yinchu and His Population Theory	373
The Promising Prospect for the Large Population Country—China	382

附 录

《中国民族人口》出版发行	389
中华民族人口研究的恢弘巨著 ——《中国民族人口》出版	390
《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出版	391

控制数量 提高质量 调整结构

- 《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出版 392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系统研究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报告》简评 394

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 增强节俭意识对话录（节选） 396

经济学家追踪 39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记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人口学家田雪原 400

创造中国人口质量的辉煌

- 记中国人口学家田雪原 406

新中国 60 年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田雪原 416

不懈追求学术真谛

-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 428

导 论

《田雪原文集》(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笔者所作绪论、总论、前言和序,共选录19篇;第二部分,为公开发表的英文论文,选录13篇。此外,同前三卷一样,选录网络直播、访谈、采访、报道、书评、书讯等11篇。内容涉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领域,时间跨度近30年,反映笔者以人口研究为主并与相关学科相结合,积极推动边缘和交叉研究的特点。

第一部分,绪论、总论、前言和序。选入本《文集》的19篇中,包括绪论7篇,其中5篇列在笔者担任主编或主笔的专著篇首,2篇列在好友主编的专著篇首。总论2篇,位列笔者主编或主笔的专著首篇。绪论和总论,主要阐述该专著的撰著背景、核心内容、框架结构、创新之处、理论和应用价值、需要讨论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举如下二例说明。

“《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研究》绪论”,为收入本《文集》7篇绪论之一,列在沙吉才研究员主编的同名专著首篇,分(一)、(二)、(三)三个部分。(一)阐述对改革开放背景的认识,从世界的改革浪潮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提出和发展,影响所及,波及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各个方面,人口的变动和发展,也必然为改革开放大潮所左右。(二)设计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影响人口变动与发展框架结构,提出并阐发:(1)对人口数量控制的影响。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孩子成本—效益发生的变动,在改革前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由于家庭生产和经营职能的恢复,孩子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等重新得到恢复和强化,从而提高了人们生育孩子的预期效益和积极性。相反,在改革力度较大和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孩子成本特别是教育成本显著提高,高收入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削减了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益和养老—保险效益,诱导人们从多生多育向少生优育优教转变,遂使生育率下降。(2)对人口素

质主要是文化教育素质的影响。关键是追加的孩子智力投资能否带来相应的效益，针对当时“花钱念书不如挣钱跑运输”、“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新的“读书无用论”，提出和阐发按劳分配要体现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倍加原则，适当向脑力劳动倾斜、提高人口智力投资积极性的建议。

（3）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男孩子效益的提升更为显著，使得一部分人偏爱男性孩子的性别偏好有所滋长。1990年人口普查0~4岁组性别比上升到110以上，已处于严重偏高状态，需要引起重视和着力解决。

（三）鉴于改革开放上述深刻而深远的影响，人口必须置于这一大环境背景之下，如何兴利却弊地驾驭未来人口变动和发展的趋势，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绪论”具体分析了未来中国人口变动和发展的八大趋势，即人口数量继续增长、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上升、人口老龄化、人口城市化、人口迁移新变动、人口流动增强、婚姻和家庭变动新趋势，颇值得重视。需要将这些趋势放到改革开放之中，寻求解决的路径和决策。

“《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总论”，为收入本《文集》2篇总论之一，列在笔者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的专著首篇。“总论”关于国际背景的阐述，重点分析了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指出：立足于人口学视角，信息化推进了人的现代化，促进了就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全球化带动全球市场的进一步形成，金融体制接轨为大势所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合作组织日益扩大，发展不平衡和财富不均越来越严重。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人口、就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是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国际背景。国内背景重点阐发经济转轨，包括：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由外延为主转变到内涵为主；社会转型，由政府主导型转变到社会服务型；人口转变，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进入“转变后”人口阶段。在国际“两化”、国内“三转”大背景下，提出和阐述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宏观思路。第一步，把高生育率降下来，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第二步，稳定低生育水平，直至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同时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调整。第三步，零增长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资源、环境状况，作出理想适度人口的抉择。这样的理想适度人口是全方位

的,不仅数量是适当的,而且素质是比较高的,年龄、性别等的结构也是合理的。如此“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第一步已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步也已经走过10年的路程,预计可在2030年前后完成,第三步则是实现人口零增长以后的事情,现在能够做到的是测算出其后的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为最终实现全方位适度人口目标奠定基础。当前的人口发展战略,应锁定在以人口零增长为主要目标,包括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全面发展上,并且有利于向下一步全方位适度人口过渡。

一般情况下,绪论和总论篇幅不很长,力求对全书作出提纲挈领的概括,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与之相比,前言和序要更短一些,目的是起一点儿“提神”的作用。选入本《文集》的前言一篇是“《中国人口政策60年》前言”。该“前言”开始,摆出对中国人口政策持不同观点的5本论著,接着1980年从本人作为首次中国人口学家代表团成员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国际会议的争论起笔,说明不同观点由来已久。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总是可以说服人的。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特别是30年来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赞同;当然,不赞同者和反对者,至今仍然有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无碍大局。开展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论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地阐发中国人口政策提出和制定的社会背景、理论依据、主导思想、基本要求和实施的效果。《中国人口政策60年》,就是本人亲历1980年人口政策出台和30年走过的不平道路,加以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方法诠释的一部实证研究专著。说它是实证研究专著,是因为研究的实体内容是社会的客观存在;而具体的阐述,不是经验式的总结,而是学术性质的讨论。提出要用发展的眼光,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发展和辩证的眼光分析,开展与时俱进的研究。

选入本《文集》的9篇序,以“《人力资本开发研究》序”为例说明。该“序”着眼于信息化、经济全球化视野,在概述自古典学派人力资本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观点,近年来的主要发展,立足货币资本获取与投资由单一竞争向多元竞争转变的基础上,着力阐释强化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本研究取得长足进步。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破解当前发展方式转变、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消除贫困、合理利用资源、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难题,在某种意义上,开发利用好人力资源、不断增强人力资本积聚的能力、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和人力资本强国是关键。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李玉江教授主持的

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力资本时空结构及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支撑能力研究”课题，同时获得与该课题接近且与之形成交叉研究的教育部和山东省支持的两项课题，最后完成《人力资本开发研究》专著，很有现实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序”介绍了该专著有关内容，包括：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区域人力资本变动、“极化效应”显著、人力资本存量区域差距呈倒U型趋势、对可持续发展构成逆向变动，以及方法论等的创新之处，该专著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第二部分，英文论文。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人口科学同其他许多社会科学一样，加快了走出国门、交流切磋和融入世界的步伐。然而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少学科相比，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从而妨碍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笔者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笔者所在的初中、高中，外语一律开设俄语，进大学仍然学习俄语，因而总共学了8年俄语。转入人口研究以后，发现俄语应用的范围过于狭窄，只好自学英语，一直处于“瓜菜代”低水平。不过深知，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研究走出去、融入世界十分必要，也就增加了几分责任感。经帮助加上本人努力，先后发表20多篇英文论文，还有10多篇日文、俄文论文，最多语种的是列入《中国基本情况丛书》的《中国人口》一书，笔者为合著第一作者，除中文本外，还译成英、法、俄、德、日、西、阿拉伯7种文本。其中的一个机遇，是1988年笔者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和《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时，与美国艾勒顿出版公司（Allerton Press, INC）签订了一项10年协议，由他们翻译每期《中国人口科学》杂志1/2~3/4文章，出版英文版《中国人口科学》（*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向各国发行。由于国外翻译水平较高，加上文章较有意义，选入本《文集》13篇英文文章中，有6篇来自该英文杂志。其余7篇或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或为学术交流演讲稿。13篇英文论文，主要涉及中国人口问题、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人口素质、人口政策等内容，力图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推出去，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促进人口科学发展。

附录。同《文集》前三集一样，是学术界和相关媒体对笔者研究工作和取得成果的报道和评介。这些报道和评介不一定十分准确，不过还是表达出一种观点，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因而选出有代表性的几篇，附录于后，以供参考和指正。

绪论、总论、前言、序

《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研究》绪论^{*}

潮，改革潮。当历史跨入 20 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新的技术革命席卷全球而来的，是改革的浪潮。这股浪潮冲击着沉睡的大地，也冲击着因工业化而不断升温的热土，一切力图摆脱困境和寻求新的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谋求改革，改革成为时代的风尚，也成为人们最热门的话题。

中国作为东方古国，正在经受改革的冲击、考验和洗礼。远者且不论，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和中期成功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提前 1 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然而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的 20 年，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贻误了宝贵时间。这中间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诸多原因，但不容争辩的一点是：当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及其管理的改革迅速兴起之时，我们却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关起门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既无改革开放意识，更无实际之举，从而拉大了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1978 年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纠正了“左”的错误，提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82 年中共十二大以后，改革全面展开，乡村由点到面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国有企业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推广经营承包制、股份制，全国城乡形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生动局面。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在 960 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甩掉贫困落后帽子，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革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也已展

* 本文原载沙吉才主编《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开；政府转变职能等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提到日程上，新的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可以说改革是波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革命。

那么，怎样改革，向着什么方向改革呢？除需要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不要忘记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要离开我们周围的环境。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成功的改革，都毫无例外地需要汲取外来的经验，争取外援，同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需要开放，开放促进改革，我国 10 多年来改革开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适应改革发展需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建立经济特区，确立沿海一批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形成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地带和环渤海为中心，包括 2 亿人口的沿海开放带，闯出了一条新的改革与开放结合之路。如今在此基础上，扩大沿边、沿江河开放带，加快内陆省、自治区的开放步伐，更有效地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开放同改革结合起来向着多层次、多渠道、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引向深入。

由沿海、沿边、沿江河走向内地，由沿海 2 亿人口逐渐波及 11 亿人口的改革开放进程和新的格局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影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当然也会对人口再生产，对国家的人口管理和人口目标，对人口变动的主要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显然，研究改革开放中新的人口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的方略，是实证人口研究的紧迫课题，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参加由沙吉才研究员担任主编、鲁景精副教授担任副主编的《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研究》一书撰写的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积极探索，反复修改，提出许多有实际价值的新观点和对策性建议，是对改革开放和人口问题解决的一个实际的推动，是脚踏实地的一项具体的努力。

二

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是一个总的题目。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包括本人在内的学术界许多同志认为，主要是人口的数量控制、素质的提高、结构的调节三个方面的问题，应当实行“控制、提高、调节”的方针。不过这三个方面不是平列的，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人口的数量控制是重点，从解决现存人口问题角度说，数量控制占据主导和支配的地位，数量控制有利

于素质的提高，并且是调节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的主要手段，对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分布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提高和调节并不是消极的，人口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高低直接反映在生育水平上，可以说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就是生育率的降低，城市人口生育率远较乡村低，东南沿海人口稠密地区也比西北人烟稀少地区低，人口城乡结构和地区分布结构对人口数量控制也有一定作用。至于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属年轻型、成年型还是老年型，对人口数量变动的影响之大，则可以增长型、稳定型、减少型概括，它决定着人口变动的基本态势。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中的人口问题，主要是探讨以人口的数量控制为主线，同时涉及人口素质和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地区分布结构等问题。结合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目标、模式和表现出来的人口问题，以人口的数量控制为主要链条的关系，可表现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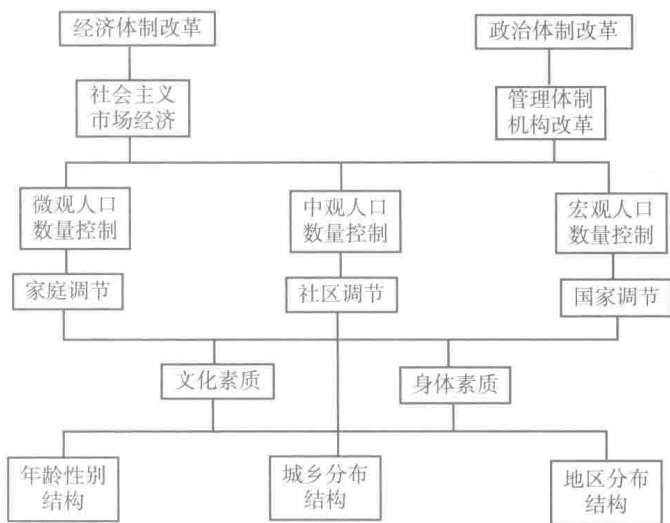


图 1 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要链条的人口关系

基于上述改革与开放关系的认识和 10 多年来的实践，改革开放主要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及其相应的开放对人口的影响，可以分别加以探讨。经济体制改革及其相应的开放对人口的影响，表现如下。

其一，对人口数量控制的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经过 10 多年的摸索，更早一些可从对三四十年以前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开始，到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要积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法则，其基本的价值观念必然渗

透到人口生产中来，给支配人们生育行为的孩子成本—效益学说提供发挥作用的条件。按照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中的生育行为理论，个人和家庭对孩子的取舍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的边际孩子成本和孩子提供的预期效益：若净成本为正值，该边际孩子父母不需要；若净成本为负值，需要；若净成本为零，取决于随机因素。尽管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但孩子成本—效益的作用仍客观存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无疑加大了孩子成本—效益作用的效应，在实践中产生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在经济体制改革前期或者虽然改革进行时间较长但发展仍较迟缓地区，由于乡村以家庭户为基本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镇个体、合营、合资、外资等企业的发展，使丧失已久的家庭生产职能在颇大程度上得到恢复，养老—保险效益刺激了家庭生育特别是生育男孩的欲望，阻碍出生率的下降。众所周知，在中国近 40 多年的人口变动史上，1953~1957 年为一个生育高潮期，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2.4%；1958~1961 年为一个生育低潮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0.5%。如以 23 岁作为妇女生育峰值年龄，则 1976~1980 年应为高潮期，1981~1984 年应为低潮期，然而事实上的上述期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恰好相反，如表 1 所示。^①

表 1 1976~1984 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

单位：‰

年 份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76	19.9	7.3	12.6
1977	18.9	6.9	12.0
1978	18.3	6.3	12.0
1979	17.8	6.2	11.6
1980	18.2	6.3	11.9
1981	20.9	6.4	14.5
1982	22.3	6.6	15.7
1983	20.2	6.9	13.3
1984	19.9	6.8	13.1

为什么理应为生育低潮期的 1981~1984 年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明显高出理应为生育高潮期的 1976~1980 年的水平呢？可能有多方面的原

① 《中国统计年鉴 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因,但是边际孩子效益上升从而刺激人们多生多育,是本源的原因。与此相对应的是,1986~1997年的前后因受1962~1973年生育高潮形成年龄结构影响而出现了新的一次生育高潮,然而在过去的6年中人口出生率维持在21‰至23‰之间,自然增长率也均在16‰以下,仅比20世纪80年代前期略高一些,并没有形成很高的高潮。这中间除了政府大力加强人口控制,计划生育部门做了许多艰苦工作外,一些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较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孩子成本—效益发生的某些转变,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以包括苏州、无锡、常州所辖县、市在内的苏南地区为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兴办乡镇企业等多种形式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走出了一条经济新发展的“苏南模式”,同时人口数量控制也达到了新的水平。1986~1990年的人口出生率均控制在15‰左右,同世界发达地区水平比较接近,创造了低生育率的人口再生产的“苏南模式”。虽然苏南人口模式的产生有着文化的、政治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经济是基础,由经济发展水平引起的孩子成本—效益的变动是根本的原因。在孩子成本方面,随着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的缩小,使得农业劳动力过剩和向乡镇企业转移问题十分突出,转移的重要条件是要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从而普遍加大了家庭对孩子的智力投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怀孕和分娩期间的费用也在不断上升,因休假和减少工时而减少的收入自然通过影子价格进入孩子成本。这就使边际孩子成本特别是质量成本上升很快,培养一个孩子的周期也大大拉长。另一方面,由于人均收入1989年已达到2470多元,比全国水平高出1倍以上,这就为个人和家庭通过储蓄和寻求保险解决养老创造了条件,也为集体经济壮大后举办养老保险事业提供可能,使得孩子最重要的养老—保险效益显著下降,开始打破“养儿防老”的传统格局。^①这样,一端是以孩子质量成本为主要标志的孩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另一端是以养老—保险效益下降为主要特征的孩子效益的明显下降,导致人们投向孩子的成本由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使生育率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初步展示了,改革开放对人口转变良好影响的蓝图,代表着发展的方向。目前这张蓝图正在改革开放做得卓有成效的地区铺展开来,由沿海向内地伸展;不过对于多数地区尤其是内地大多数地区说来,尚未走出边际孩子主要效益增值的阶段,多子多福、多生多育还有着客观的经济基础。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不仅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必

^① 参见徐国强等《苏南模式下的妇女生育水平及相关因素》,《人口动态》1992年第4期。

由之路，而且也是实现生育转变和谋求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治本方略。

其二，对人口素质主要是文化素质的影响。这个问题同前面的问题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搞得比较好的地区，存在着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的客观要求，遂使生育率下降。不过这种转移需要一定的条件，如以 Q 代表边际孩子智力投资质量成本， I 代表该成本可能带来的预期效益，则可能有如下三种情况发生。

$I < Q$ ，表明追加的智力质量成本不能带来相应的效益，因而不可能发生转移或者发生了也难以坚持下来。

$I = Q$ ，表明追加的智力质量成本同可能带来的预期效益相当，是可能发生转移的必要条件。

$I > Q$ ，表明追加的智力质量成本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益，是可能发生转移的充分条件。

那么，改革开放对于 Q 和 I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同样应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从理论上说，在改革开放前期和经济、技术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第 I 种 $I < Q$ 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家庭在孩子身上投下的智力文化投资并不能够带来相应的追加效益。相反，由于技术构成比较低，只要将孩子培养到一定年龄，具有一定的体力便可从事一定的劳动，使劳动—经济效益收效早，见效显著，从而阻碍着孩子质量成本的上升。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出现中、小学生辍学严重，“花钱念书不如挣钱跑运输”，“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现象， $I < Q$ 是根本的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科技、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一些先进地区将会达到第 II 和第 III 种效应，即 $I \geq Q$ ，从而为增加智力质量成本奠定了基础。在苏南地区，新增人口就业和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是乡镇企业，主要是工业企业，但几乎都有一项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即乡镇企业招工条件之一，要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某些企业要求还要更高一些。而且这些企业职工劳动报酬同文化程度、技术熟练程度直接挂钩，体现了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倍加的按劳分配原则，反过来激发了人们进行人口智力投资的积极性。从总体观察，打开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的大门，仅仅是开始，少数先进地区作了示范，少数落后地区对此还很陌生，大部分地区则处在开始转移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三，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关于人口结构，有所谓自然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三结构”一说，也有一些学者不赞成这种分法。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出发，其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人口年龄性别结